

音乐家萧友梅与孙中山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助理馆员 马煜

阅读提示

萧友梅一生追寻着自己心中挚爱——音乐，沿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在崎岖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他始终坚持着年轻时就深埋心中的民主精神与革命精神，始终以孙中山思想为支撑，他的脑海里始终回荡着“音乐教育”“教育救国”的高尚旋律，他以一腔热血自始至终投身于救国救民的时代洪流之中，谱写了一篇灿烂的生命华章。

上海孙中山故居是革命伟人孙中山先生与妻子宋庆龄在上海唯一的家，其展出的诸多珍贵馆藏文物中，有一件展品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即《五四纪念爱国歌》的作曲者萧友梅赠送给孙中山的题签明信片。

萧友梅，1884年1月7日，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1940年12月31日，逝于上海。他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音乐理论家、作曲家，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这样一位音乐大家，是如何同孙中山产生交集的呢？

缘起澳门

1889年，年仅5岁的萧友梅随父亲移居澳门，在儒生陈子褒所设的私塾“灌根草堂”学习。陈子褒倾向新学，参与过“公车上书”并加入“保国会”，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他认为要实现国家富强，必须从教育妇女儿童入手，而不能将希望寄托在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身上。于是，陈子褒在澳门开办学校，从事启蒙教育工作，这所私塾除了教授“四书”算术之外，还教授英文和日文，所以，“灌根草堂”颇有别于广东一般的所谓“搏斋”。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萧友梅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国学知识储备，还拥有了良好的外语基础与口语能力，为他日后出国留学作了充分的准备。

也恰恰是在澳门这块福地，萧友梅结识了孙中山，从而开始了他们经年的友谊。萧家移居澳门3年后，1892年，孙中山来到澳门开设诊所。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也是广东香山人士，同是异地漂泊的老乡，孙中山很快同萧家熟识，萧友梅也因此从小认识孙中山。两人虽然相差18岁，但是孙中山的人格魅力和深厚学识反倒成就了这对忘年交，萧友梅从一开始以子侄身份到最终成为孙中山革命道路上的同行者，正可谓是缘分使然。

在康梁维新变法的直接促使下，邓家仁、邓家让两兄弟于1898年的春天共同创办了广东首家民办新式学校——时敏学堂。带着在澳门打下的良好基础，萧友梅来到广州，在这里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涯。1901年，作为时敏学堂首届毕业生中的一员，萧友梅与同窗们在堂长（校长）邓家仁的带领下赴日本留学。萧友梅先是在东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学习，后转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同时兼在东京音乐学校专修钢琴与声乐，其所学专业方向在当时的赴日留学生中可谓凤毛麟角。

日本再会

当时的日本作为保皇派、立宪派、革命派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会聚的大舞台，见证了孙中山与萧友梅的再度会面。

1905年8月，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1906年，萧友梅在留日求学的第5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和活动的影响，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民主革命者，热情投身于辛亥革命的伟大洪流中。在日本，萧友梅运用自己的留学生身份，

主动担当了革命哨兵的角色，积极掩护孙中山在日本开展民主革命活动，加上他是专攻音乐的学生，反而不容易引起日本密探的察觉，他的住处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孙中山与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商议革命的集中地之一。常常是孙中山、胡汉民等在屋内商讨事宜，萧友梅以同孩子玩耍为由头，抱着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孩子到门口，充当望风者。廖仲恺之女廖梦醒还曾经对萧友梅的儿子萧勤回忆到童年时“萧叔叔弹钢琴”的往事。

1909年，萧友梅毕业归国，他通过了清政府的留学生毕业考试，取得了文科举人的学位，之后留在教育部，担当“视学官”。在当时，这份职务相当于一个巡视教育的“七品小京官”。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萧友梅则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同年，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萧友梅旋即追随孙回广东，在胡汉民主持的广东省都督府任教育司学校科科长。在他工作期间，萧友梅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提倡男女同校、注重军国民教育等新思想新风气。

音乐深造

1912年10月，得知教育司司长蔡元培从北京发出公费留学的通知后，在孙中山的支持与鼓励下，萧友梅于同年11月作为公派留学生远赴德国进入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深造。

在德国，他同时进入莱比锡大学研究教育学，在校期间的萧友梅，一头扎进音乐知识的海洋中刻苦学习。对待音乐专业，萧友梅一直认真钻研且成绩优异，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位以音乐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如火如荼，交通的阻断导致萧友梅暂时无法回国，他又跑去柏林大学听课，积极参加音乐学课堂讨论会，后来又进入施特恩音乐学院，进行作曲、乐器、指挥及古谱读法等研究。1920年，萧友梅回国，面对当时乌烟瘴气的中华大地，他将目光锁定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北京，决心在那里推广音乐与教育事业。

精神传承

萧友梅将主要精力放在音乐教育事业的建设上，不论是从他音乐作品的创作上还是个人行事风格上看，他无疑是孙中山思想与精神的支持者和传承者。

1920年，萧友梅回国来到北京任教，在这里他还能感受到五四运动热浪的余热，在这样氛围的熏陶下，他创作了一大批（如《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问》《国土》《中华好》《华夏歌》《渐渐秋深》《南飞之雁语》《五四纪念爱国歌》《国耻》《国民革命歌》等）具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时代歌曲，包括了钢琴曲《哀悼引》和随后据此改编而成的军乐曲《哀悼进行曲》，这些音乐作品充分体现了萧友梅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

以《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为例，这首作品旋律雄壮，歌颂了在辛亥革命中逝去的烈士以及他们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萧友梅通过《问》这首作品抒发了爱国忧民的感情，展现了作者内心的苦闷彷徨和对山河破碎、军阀混战的强烈不满；这种情感在《南飞之雁语》中表现得更为深刻，这首歌曲的作词者是易韦斋，他与萧友梅都曾担任过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他们虽然时时怀念处于危难中的孙中山，却苦于军阀混战统治，只能遥望南天借“雁语”抒怀。《总理奉安哀辞》是萧友梅为纪念孙中山逝世而作，面对他思想的启蒙者、革命的领路人，这首作品以悲哀的旋律、凝重的节奏，深刻表达了对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无尽哀思。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友梅在1938年2月出版的《音乐月刊》上的《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一文中就曾大声疾呼：“在这国难期内，如环境许可时，应尽力创作爱国歌曲，训练军乐队队长及集团唱歌指挥，使他们在最短时期可以应用出去……关于此种工作如能由政府提倡，更容易发生效力。”通过改良旧音乐、创作新音乐来建立中国的国乐是萧友梅矢志不渝、奋斗终生的目标，他明白，只有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才能真正实现中国音乐的新生。萧友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行动的。

“九一八”事变后，他立即支持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师生迅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同时还带领师生们走上街头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在民族存亡的重要关头，萧友梅鼓励师生们“创作爱国歌曲，激励军民勇气”，并创作了抗日爱国歌曲《从军歌——为义勇军作》。不仅如此，萧

友梅还组织国立音专师生到杭州专场举行“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对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萧友梅积极支持上海国立音专师生参加声援活动并举行示威游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萧友梅在《音乐月刊》中写道：“必须注意如何利用音乐唤醒民族意识与加强民众爱国心。”

萧友梅一生追寻着自己心中挚爱——音乐，沿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在崎岖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他始终坚持着年轻时就深埋心中的民主精神与革命精神，始终以孙中山思想为支撑，他的脑海里始终回荡着“音乐教育”“教育救国”的高尚旋律，他以一腔热血自始至终投身于救国救民的时代洪流之中，谱写了一篇灿烂的生命华章。